

您的位置：比较政治研究网>实证分析

## 试论欧洲政治中政党与公民社会的相互转化趋势

作者：高奇琦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05期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05期

作者简介：高奇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内容摘要：上世纪中后期以来，欧洲政治中出现了政党与公民社会相互转化的趋势。政党的公民社会化表现在组织结构的扁平化、行为取向的议题化、民主模式的参与化等三方面。公民社会的政党化主要表现为公民社团在组织制度化和议题扩展之后直接以政党的身份进入政治领域。未来来看，欧洲政治中政党公民社会化的程度可能要远远低于公民社会政党化的程度。政党可能会吸收公民社会的某些沟通方式和社会动员技巧，而并非完全转变为公民社会的松散政治模式。而公民社会政党化则可能成为未来欧洲政党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趋势。

关键词：政党；公民社会；政党的公民社会化；公民社会的政党化

### 一、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联与一致

对政党内涵的界定主要有三类观点：第一类将政党视为促进国家利益的志同道合者的团体，这一类定义有道德主义的倾向，以英国学者埃蒙德·柏克（Edmund Burke）为主要代表；[\[1\]](#)第二类将政党视为个人获取公职和社会遴选精英的一种政治工具，这一类观点以美国学者熊彼特和萨托利为代表；[\[2\]](#)第三类将政党视为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其政纲的政治组织，这一类观点沿袭了马克思主义对政党阶级性强调的传统，以中国学者高放为代表。[\[3\]](#)

关于公民社会概念的内涵也主要有三类观点：第一类将公民社会等同于由非官方机构或团体组成的自治空间或公共领域，这类观点主要受到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影响；[\[4\]](#)第二类观点将公民社会界定为介于经济和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由私人领域、团体领域、社会运动及大众沟通形式组成，这类观点主要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简·柯亨（Jean Cohen）和新学院大学教授安德鲁·阿拉托（Andrew Arato）为代表；第三类观点则试图整合前两种观点，认为公民社会由社会成员在自愿和自治基础上进行社会经济活动的私人领域和进行政治活动的公共领域共同组成，这一类观点以中国学者邓正来和景跃进为代表。[\[5\]](#)

从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定义来看，两者存在密切关联。政党是联结国家与社会的桥梁，换言之，政党的根基或者说政党的一部分是处于社会之中的。熊彼特定义中对政党社会选择功能的强调，以及马克思对政党阶级性（社会某一部分的代表）的强调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而公民社会是社会中较为活跃、易于结社的那一部分。从这个角度讲，政党与公民社会甚至会有一部分重合。譬如，处于社会之中的那部分政党便与进行政治活动的公共领域可能重合。意大利学者毛里齐奥·科塔（Maurizio Cotta）的界定会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解释这一问题。科塔将政党主要分为四部分：政府中的政党（是指政党在政府中任职的主要官员）、议会中的政党（指该政党在议会中的议员）、成员组织的政党（包括该党的常设组织、干部和普通成员）、选民中的政党（包括该党的忠实支持者和潜在选民）。[\[6\]](#)从这个界定来看，而后两部分，特别是最后一部分则与公民社会关系密切，甚至有很大程度的重合。

从政党类型学的角度来看，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的群众型政党（mass party）发展时期，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群众型政党最初主要是左翼政党的发展形态，但这种变化同样影响到右翼政党的组织结构变迁。与之前的精英型政党（elite party）相区别，群众型政党在议会外生成，而且将某一阶级或群体作为其政党的社会基础，[\[7\]](#)这意味着群众型政党从一开始就与公民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群众型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密切联结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通过层级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发展而与基层社会紧密联系，二是通过与商会、工会、农会、宗教团体、妇女组织等各种社团结盟而扩展其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然而，二十世纪中期之后发生了群众型政党向全方位政党（catch-all party）或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发展的趋势，[\[8\]](#)这种趋势表明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复杂的变化。

## 二、政党与公民社会的传统边界

尽管如此，政党与公民社会的界限还是清晰的。即便是在两者密切的群众型政党时期，政党与公民社会的根本性质仍然是不同的，政党主要在政治领域活动，而公民社团主要在社会领域活动。耶鲁大学政治和社会科学斯特林荣誉教授胡安·林茨（Juan J. Linz）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阿尔弗雷德·斯蒂潘（Alfred Stepan）区分了三种社会：公民社会（以利益和价值观为中心）、政治社会（以选举为中心）和经济社会（以市场为中心），这三种社会与国家机构和法治一起构成了影响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五个重要领域。[\[9\]](#)林茨和斯蒂潘的界定表明，政治社会是政党活动的主要场域，而政党与公民社会分别处于两个不同的活动领域。在公民社会理论中，无论是强调公民社会制衡国家的托克维尔一派，还是强调公民社会对抗国家的潘恩一派，抑或是强调公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的伯恩哈德一派，[\[10\]](#)几乎都强调公民社会独特的本体地位及其与政治社会的清晰分界。

当然，这些讨论仅仅是一般性的分析。要进一步讨论政党与公民社会相互转化的问题，需要对两者的特征进行清晰的比较。公民社团是公民社会中的主要行为者。本文在这里对政党与公民社团的特征进行比较：第一，两者的组织结构不同。政党多呈现出垂直的金字塔式组织结构，而公民社团则多呈现出横向的扁平式组织结构。欧洲的主流政党和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政党大多在二十世纪中前期采取了群众型政党的模式，群众型政党带有较浓厚的集权倾向，以层层节制的领导方式来维持上下层党员之间的沟通。这种组织体制相对开放性较差，组织权力集中于高层，沟通方式主要采取命令式的纵向沟通，强调党员的纪律性和服从性。而公民社团的扁平式组织层级较少，组织成员之间身份平等，成员之间主要采取对话和协商等横向沟通方

式，强调组织成员在组织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对外界环境的开放性较强，组织的边界不明显，组织内成员与组织外参与者呈现出明显的流动性特征。

第二，两者的行为取向不同。政党行为往往更具有纲领倾向，而公民社团行为则更具有议题倾向。在西方政治中，政党的最主要功能是赢得选举，而政党为了便于锁定选民的投票选择，往往会将其一整套的政策主张凝练为容易分辨的意识形态标识。这一意识形态的标识也多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而将政党的行为紧紧地锁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公民社团从其产生便往往致力于某一社会问题的解决，其小巧灵活的特点也决定其不会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的约束。当然，公民社团在其诉求过程中也容易产生某些极化的价值倾向，但这种价值倾向的不稳定性和单议题性决定其还不具备意识形态的程度。

第三，两者对应的民主模式不同。政党主要对应的是选举民主，而公民社团主要对应的是参与民主。西方政党的最主要目的是通过选举竞争赢得公共职位和政治权力。西方主流政党的第一要务便是运用意识形态标签、正式组织和选举技术等方式实现选票最大化。公民社团则主要关注民主参与的过程，而不是选举结果。一方面，公民社团通过游说政府或抗议施压等方式来进行民主参与，另一方面，公民社团在其内部活动时也充分展示一人一票或领导轮换等直接民主的运行特点。

### 三、欧洲政治中政党的公民社会化

前一部分描述了政党与公民社会的传统边界。事实上，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欧洲政治来看，政党与公民社会的传统边界正在被打破，政党与公民社会之间出现了相互转化的趋势。这一部分首先描述和论证欧洲政治中正在发生的政党的公民社会化的问题。支撑这一判断的论据如下。首先，政党的组织结构在逐渐从金字塔式结构向扁平式结构转型。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欧洲的政党组织很难再维持一个较为集中的权力，政党权力从党的中央机构向议会党团流失；在正式政党组织中，组织层级也在逐步减少，原先采取集体会员制度的左翼政党逐步实行个人会员制度，一些右翼政党也开始尝试取消党的中央管理层次；政党的开放性大为增加，包括在政党会议时邀请非党人士列席和表达意见、青年人和外籍人士在党内担任一定职务、入党程序由审批制变为注册制等；对党员纪律性的强调也在下降，允许成员在党内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以及政党组织活动的常规性和制度性都在变化。

其次，政党的行为取向在逐渐从意识形态向具体议题转变。一方面，政党意识形态逐渐呈现中间化的特征。为争取中间阶层的认同和支持，一些主要政党的意识形态不断向中间靠拢，纯粹的意识形态纷争逐步减弱，左右政党政治逐渐呈现趋同趋势。另一方面，具体议题在政党行为取向中的作用日益增加。在选举政治中，政党在某些关键议题上的表态和倾向已经越来越有效地影响到选举结果。[\[11\]](#)在日常政党政治中，德国社民党的项目党籍（以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或项目为中心设立党组织）制度以及类似的制度安排，都表明目前的欧洲政党在尝试将议题作为政党整合的新手段。[\[12\]](#)

最后，政党的民主模式在从选举民主向参与民主部分地进行转移。一方面，一人一票制的直接民主逐渐成为欧洲中左翼政党的党内参与模式，英国的工党已经在这一点的政党实践上卓有成效，从而扩大了党内成员对政党事务参与的积极性，德国社民党和法国社会党等都在启动相应的制度变迁。另一方面，政党通过一些论坛和非正式网络来推进协商民主，满足政党成员和追随民众对参与性民主的需求。譬如，英国工党在中



中央成立全国政策论坛，在基层成立促进者网络，通过直接对话和电子沟通等方式促进协商民主方面的政党实践。[\[13\]](#)英国保守党也建立了保守党论坛和保守党网络这类的民主参与平台，鼓励党员和党外人士对政党政策进行讨论。[\[14\]](#)

导致政党公民社会化的主要原因如下：第一，政党政府的发展导致政党中央组织权力的流失。卡茨和梅尔的卡特尔政党概念揭示了西方政党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即政党越来越受到国家和政府的资助。[\[15\]](#)这一特征导致议会党团对政党组织募集资金功能的依赖性下降，从而导致了政党中央机关权力的部分空心化。中央机关权力的流失导致其对中下层党员控制力的下降，也促使其启动了政党组织结构的变革。第二，选举政治的传媒化导致候选人不再依靠政党的正式组织来进行动员。我国学者罗云力用政党的传媒化来描述这一趋势，即选举政治日益变成媒体政治的竞争，政党在选举中的竞争越来越依靠传媒的力量。[\[16\]](#)这一变化使得候选人对政党组织动员的依赖下降，从而使得政党正式组织的层级制动员结构失去存在的意义。因为通过媒体主要动员的是中间选民，所以选举政治的传媒化在某种程度上还导致了意识形态的中间化。第三，新社会运动的发展促使政党吸收了公民社团运行的一些新元素。在新社会运动发展早期，政党多对其持反对和怀疑态度。但新社会运动其内含的一些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如对参与民主和议题政治的强调等。在短暂的排斥之后，欧洲的传统政党接受了这些新鲜的元素，并将其纳入政党革新的范围之内。

#### 四、欧洲政治中公民社会的政党化

政党与公民社会相互转化趋势的另一部分是公民社会的政党化，即公民社团突破其主要活动的社会领域而直接进入政治领域，并参与议会选举以及进而参与执政。这里最典型的案例是欧洲环境保护组织向绿党的转型。20世纪欧洲六七十年代的环境社会运动催生了一大批环境保护组织，这些组织最初采取社会抗议的运动模式，但在八十年代纷纷进入参加议会选举，并相继逐步取得突破。[\[17\]](#)到九十年代，芬兰、意大利、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的绿党先后进入政府，德国绿党还于1998年实现了与德国社民党的联合执政。另一组重要的例证是西欧的极右翼社会或宗教组织逐渐发展为极右翼政党。波兰的啤酒爱好者党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这一组织起源于一个社会倡议，即倡议在讨论政治问题的俱乐部中提供好品质的啤酒，这一点与结社和表达的自由、知识的相互包容以及较高的生活水平等联系在一起。然而，在1991年，这一组织在波兰下院中得到16个议席。[\[18\]](#)

通过对欧洲绿党等新政党案例的经验总结，可以发现公民社会的政党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完成组织的制度化和相同功能团体的整合。社会团体一般都缺乏正式的组织建设，成员流动性强，规模也比较小，缺乏较大地域范围的影响力。因此，社会团体在进入议会选举时，特别是全国议会选举时，一般要完成相同或相近团体的联盟与合并，并需要在组织功能的复杂性和组织成员的凝聚性上有所建树。德国绿党在发展过程中就经历了成立大会的整合（1980）、与东德绿党的合并、与“联盟90”的合并等几次组织整合。奥地利绿党也出现了激进的绿色选择与温和的联合绿党合并的情况。比利时绿党则由阿加莱弗党（Agalev）和生态党（Ecolo）整合而来。[\[19\]](#)二是完成单一议题的扩展以及与相关议题的整合。公民社团的产生往往基于某一社会议题，单一社会议题在某一段时间内可能会迅速引发公众的兴趣，但又很容易在短时期内消退。议题的解决或消退都会引发公民社团的存在危机和合法性危机，特别是其在进入政治领域后。政治领域中的竞争需要有持久的影响力，这就需要这些团体把单一议题扩展为综合议题，并在这些议题中抽取出最核心的成分，整合成可以作为政治标签的意识形态纲领。譬如，欧洲绿党多数将单一的环境保护议题扩展为直接民

主、妇女权利、35小时工作制、与第三世界合作、反对核能与武器出口等多个议题，并将生态学、社会责任感、基层民主、权力分散化、非暴力等新政治原则作为其政党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

促使公民社会政党化的因素如下：第一，社会议题政治化的深入发展。二十世纪中后期欧洲新社会运动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社会议题的政治化，即环境、同性恋、女性权利等原本属于私人社会领域的议题进入公共政治领域的讨论。这种社会议题政治化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欧洲新社会运动催生的新社会团体在进入政党竞争领域后变成新型政党。第二，抗议行为的成本与绩效。新社会运动中公民社团的主要行为模式是社会抗议。如果某一社会利益需要表达的次数有限且表达之后很容易实现，那么社会运动的成本是相对较低的。但如果某一议题是复杂的长期性议题，那通过社会运动来影响议员的提案显然是成本较高的选择。社会抗议的负外部性还体现在其经常演化为街头暴力和流血冲突上。社会抗议的政治绩效往往是不稳定的，取决于议员对社会议题和抗议行为的个人感知和利益平衡，而且，社会抗议很难对议员的政治行为进行推促和监督。第三，选举政治中的机会结构。二十世纪后期欧洲的选举政治结构对于这些社会团体而言意味着两点，一是新政党的进入门槛不高。欧洲大陆国家多数采取比例代表制，这一制度对于新政党是非常有利的，仅存在一定的进入门槛，如德国的5%限额、瑞典和奥地利的4%限额等。二是存在代议的真空地带。欧洲多数的传统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还没有将后现代社会的新阶层利益和后物质主义的新政治原则纳入其代议的范围，这在某种程度上给这些新政党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机会。

## 五、影响两者相互转化的因素

需要说明的是，仍然存在一些阻挠或影响欧洲政党与公民社会相互转化的因素。就政党公民社会化的问题而言，一些传统的因素仍然在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一，政党纲领的政治标识作用仍然非常有效。极右翼政党在本世纪初欧洲选举政治中的优异成绩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选民厌倦了主流政党的中间化路线，没法对弱化政治标签的主流政党候选人进行选择，所以将这些流动的选票投给那些相对新颖的激进主张。第二，政党的正式组织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扁平结构和权力分立导致的最大问题是政党凝聚力的下降。特别是在欧洲政治中，单个的议员是没有意义的。而且，西欧的多数政党仍然规定，党的领袖和议会候选人由党员直接选举产生或通过党员代表间接选举产生。这些都强化了政党作为整体的力量。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德国社民党、英国工党和保守党等又重新开始强调政党的纪律性。[\[20\]](#)第三，政党协商民主最被人诟病的地方就是其效率不足。协商民主只能作为选举民主的补充，而不能成为选举民主的替代。政党协商民主可以增加政党对民众代议的合法性，也可以满足党内成员和党外群众对政党政策参与的需要，但政党协商民众在解决问题时的效率是受到质疑的。政党事务的复杂性、政党议题的整体性和政党协商参与者的广泛性都导致了政党协商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上不能发挥主导作用。党内选举和高层决策的结合仍然是欧洲政党处理政党关键事务时使用的主导方式。同时，参与并赢得政治选举仍然是政党的第一要务。唯有通过选举竞争，政党才可以执掌政权和实现其政治纲领。

同样，公民社会政党化的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仍然存在一些影响公民社会政党化的因素：第一，组织制度化的困难。强调基层民主的新型政党比较难解决组织整合的问题，同时也会存在运行效率问题。根据亨廷顿政治制度化的四个标准——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21\]](#)新政党需要因应环境变迁来调整其职能的适应性，构建一定数量且分工适当的层级组织，避免外界非政治团体和非程序的影响，以及在内部达

成某种程度的意见一致。而这四个制度化标准对于刚刚从社会团体转型而来的新型政党而言是不小的挑战。第二，意识形态整合和政治纲领实践的困难。如何把单一的议题倾向整合为完整的政治纲领这本身是非常困难的，更困难的是再将整合的政治纲领表达为可以吸引更多选民的政策。绿党和极右翼政党已经部分地解决了政治纲领整合的问题，但在落实为有效政策的问题上停滞不前。生态主义主张作为一种理念，许多民众是接受的，但要转化为具体政策就可能影响到民众的社会福利或工作就业等方面。如何在保持原有政治理念特色的基础上，增加政策的可行性和适用性是新政党必须面对的问题。第三，政治机会结构的变化。如前所述，新政党在二十世纪后期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代议真空的出现。但是，如果主流政党意识到这一问题，而主动采取吸纳新政治元素和议题的态度，那留给新政党的政治空间就会大为减少。正如欧洲政党政治中出现的，主流左翼政党正在吸纳生态主义政党和其他左翼自由主义政党的政治元素，而主流右翼政党正在吸纳极右翼政党在动员选民时的议题和策略，这种政治机会结构的变化对于新政党而言并不是个积极的信号。

## 六、结语

整体来看，欧洲政治中政党与公民社会的相互转化可以归结为一种正在发生的趋势。但这两种趋势的程度是不同的。政党公民社会化的程度要远远低于公民社会政党化的程度。就政党的公民社会化而言，未来发展的趋势更可能是政党吸收公民社会的某些沟通方式和社会动员技巧，而并非完全转变为公民社会的松散政治模式。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政党会被公民社会取代。如美国康奈尔大学社会学教授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指出的，关于政党与新社会运动的许多文献实际上过低估计了政党在适应新政治方面的能力。[\[22\]](#)而公民社会政党化则可能成为未来欧洲政党政治中的一个新趋势，特别是在那些政党进入门槛较低，且内部出现代议真空的政治中。但公民社团要完成向政党的完全转型，其中的阻力和困难也非常大，最主要的困难是政治组织的进一步制度化和政治纲领在实践中的推行。

On the Trend of Mutu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and Civil Society in European Politics

---

[[1]] Edmund Burke, "Thoughts on the Cause of the Present Discontents (1770)," in Paul Langford, ed.,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p. 317.

[[2]] [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13页；[意]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95页。

[[3]] 高放：《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页。

[[4]] 何增科：《公民社会与民主治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5]] 邓正来、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香港）1992年第1期。

[[6]] 毛里齐奥·科塔：“定义政党和政府”，载[法]让·布隆代尔和[意]毛里齐奥·科塔：《政党政府的性质——一种比较性的欧洲视角》，曾森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1—61页。

[[7]] André Krouwel, “Party Models,” in Richard S. Katz and William Crotty ed., *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2006, p. 254.

[[8]] 群众型政党向全方位政党的转变是德裔美国学者奥托·基希海默尔（Otto Kirchheimer）提出的，而群众型政党或全方位政党向卡特尔政党的转变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和荷兰雷登大学教授彼得·梅尔（Peter Mair）提出的。前者主要描述政党出现意识形态的中间化，政党组织的规模趋于缩小，政党逐渐向所有阶层开放，而党内的异质化程度提高。后者主要描述政党与国家的结合，强调政党资源主要来自国家补贴，政党运作越来越呈现出资本密集型的特点。参见Otto Kirchheimer, “The Political Scene in West Germany,” *World Politics*, Vol. 9, 1957, p. 437; Richard Katz and Peter Mair, “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 *Party Politics*, Vol. 1, No. 1, 1995, pp. 5-28.

[[9]]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15.

[[10]] 何增科：《公民社会与民主治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66—67页。

[[11]] Christoffer Green-Pedersen,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Issue Competition: The Changing Nature of Party Competition in Western Europe,” *Political Studies*, Vol. 55, 2007, pp. 607-628.

[[12]]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课题组：“全球信息化背景下西方主要政党组织发展趋势研究”，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3期，第16页。

[[13]]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课题组：“全球信息化背景下西方主要政党组织发展趋势研究”，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3期，第16页。

[[14]] 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课题组：“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国外一些主要政党组织发展趋势研究”，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3期，第10页。

[[15]] 卡茨和梅尔认为，欧洲的政党与国家正在结成卡特尔（state-party cartel），“合谋的政党变成国家的机关，并从国家中获取资源以及确保其生存”。这种政党与国家的合谋共治（collusion）是一种双方互惠的过程，一方面政党从国家获取其行动的资源，另一方面国家通过政党法或相关法律对政党组织及其活动进行规制。参见Richard Katz and Peter Mair, “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 *Party Politics*, Vol. 1, No. 1, 1995, pp. 5-28.

[[16]] 罗云力：“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传媒党化”，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第26—30页。

[[17]] 郇庆治：“从抗议党到议会党：西欧绿党的新发展”，载《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第67页。

[[18]] John Kenneth White, “What is a Political Party?,” in Richard S. Katz and William Crotty ed., *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6, p. 5.

[[19]] 郇庆治：“从抗议党到议会党：西欧绿党的新发展”，载《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第62—64页。

[[20]]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课题组：“全球信息化背景下西方主要政党组织发展趋势研究”，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1]]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8页。

[[22]] Sidney Tarrow,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Political Parties and Social Movement of the 1960s and 1970s in Italy,” in Russell J. Dalton and Manfred Kuechler, ed., *Challenging the Political Order: New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 in Western Democrac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53.

本站所收集的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和刊物所有，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

[\[关闭窗口\]](#)